

疏离与渴求

——论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缺父”叙事策略

黄 鹤, 颜 敏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新时期以来许多女性作家笔下的母性书写选择了“缺父”的叙事策略,通过“缺父”视域下母亲苦难现实处境的书写,展现出女性生命个体中蕴藏着的母性力量,使地母原型的文化品格得以全面审视。同时“缺父”视域下的母女关系书写在现代审丑意识和女性自觉意识的双重影响下,加速了母性神话的解构。母系家族题材小说的繁荣表达出女性作家在“缺父”视域下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时代诉求。

关键词:母性;“缺父”;女性谱系;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0)02-0090-07

Alienation and Longing

——On the Maternal Fatherless Writing of Female Writers in the New Era

HUANG He, YAN 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many female writers have chosen the fatherless narrative strategy in the maternal writing. It shows the maternal power in the female's individual life by writing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of maternal mise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k of fathers 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maternal prototype could be examined closely. Meanwhile, the writ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the fatherless horizon has sped up the deconstruction of maternal myth, affected by the modern ugly consciousness and the female self-awareness. The prosperity of matrilineal fiction has expressed the era demand of female writers to construct their own subjectivity in the absence of fathers.

Key words: maternity; “fatherless”; female pedigree; subjectivity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笔下的母性主题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缺父”的叙事策略,具体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父亲被完全放逐于文本之外,处于空白状态。如池莉《你是一条河》中辣辣的丈夫王贤木在小说开头就死于一场飞来横祸;鲁敏《墙上的父亲》中父亲根本就没出场,仅以他的照片作为开场白。另一种是父亲角色被弱化,退居文本边缘。如张洁《无字》中兵痞顾秋水连养活自己都困难,一直视叶莲子和吴为母女俩为累赘;孙慧芬《秉德女人》中“匪子胡”来去无踪,无暇顾及家庭生活。这种“缺父”视域下的母性书写与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日益高涨密切相关。女性作家在重塑母亲形象的叙事主题下急欲寻找合宜的叙事策略来跳出男权话语的窠臼,完成自身主体性建构,“父亲的缺席”为女性在

收稿日期:2018-03-1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新时期以来母性主题小说研究”(编号:18WX05);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叙事研究”(编号:14SKJ10)

作者简介:黄 鹤(1978-),女,江西萍乡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颜 敏(1955-),男,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本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打开了一扇新窗户。女性作家选择“缺父”叙事策略,一方面将母性的自然属性在文本中大肆渲染推向极致,显示出母性力量的本源性和坚韧性;另一方面也将母性视为女性的一种流动的、复杂的生命体验,塑造出一大批有血有肉、性格迥异的母亲形象。

当然,“缺父”书写也存在于新时期男性作家文本中,“父权文化”的没落表征着父子相承的传统文化根脉的断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叙事中“寻找男子汉”的时代呼唤相照应。“缺父”的文化语境造成生命个体彷徨无助的精神困境,因而“寻母”与“弑父”成为新时期男性作家家族伦理小说的双重主题,男性作家希冀以寻母之途实现自我灵魂的救赎。目前“缺父”文学现象研究大都未能跳出性别与文学的视角,女性作家笔下母性主题小说“缺父”叙事策略的意义阐释还未深入,它不仅使母女关系重写,还使母性体验成为女性自我救赎的终极力量,本文以“缺父”叙事策略为切入点,思考和探寻女性主体性建构之途。

一、地母原型:逼视人生的本真

“父亲”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联结家庭和外界的纽带,“缺父”则意味着这种纽带的断裂,母亲成为社会生活角逐场中的主角。这种生活困境对于母亲而言不啻是场战争,她除了勇往直前别无选择。为了身边一群嗷嗷待哺的未成年孩子,她必须走出狭小封闭的家庭空间,像母狮一样竖起每一根汗毛在社会角斗场上为孩子和自己去争夺生存空间,此时“活下去”成为母亲的最高生存信仰。苦难成为女性作家为“缺父”家庭设置的共同生活背景,苦难可以轻易打垮男人,却对母亲无计可施,自然性的母性力量在苦难叙事中被推向了极致而熠熠发光。女性作家大都有意规避了男性作家笔下宏大叙事的写作惯例,将历史的风云变幻隔离于家庭这方小天地,将笔触集中在日常生活场景,使母亲面对更为琐碎、更为现实、更为揪心的种种苦难,母性力量在苦难中淬火升华,成为与强大的现实原则对抗的利器,“地母式”的母亲在种种苦难磨砺中反而变得更加坚韧和刚强。

这种“男人退场、女人主事”的叙事母题,让人自然联想到原始母系社会的文化遗产——“女娲原型”。女娲神话中“造人”的故事情节肯定了生育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积极意义,因而生育成为女性为自我赋权的撒手锏。在“缺父”视域下母亲承担起父亲与母亲的双重责任,一方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与苦难进行坚韧地搏斗,另一方面对没落的父系家族力挽狂澜,抱着“家不能散”的信念在残缺的家庭中充当着“女娲补天”式的拯救者角色。地母自创世以来一直以自己的广博和肥沃孕育滋养着自然界的万物生灵,但地母温情的背后也有狰狞的一面,在孕育滋养自然万物生灵的同时也不断向自然界攫取收回生命。母亲在拉扯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在自己怀里而无能为力,与物质生活的贫困相比,子女的夭折更是对母亲的精神世界毁灭性地打击,孕育生命与收回生命都超出了母亲能力的可控范围,她只能默默忍受这种毁灭性打击带来的精神摧残。地母原型的生死循环自然观,使得母亲的苦难抗争史更增添了生死争夺的悲怆感。地母原型体现了母亲作为自然人的特质:任由生命的潮汐来去无痕,——将苦难人生宿命化。地母将天下之污泥浊水、枯枝败叶纳入大地沟壑纵深处,腐后重生,生而复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力大而无穷。这种藏污纳垢、包容一切的地母原型文化品格成为母亲在苦难的人生漩涡中泰然处之的“定海神针”,同时也使母性成为普照世间万物、救疗他人的“净化剂”。

女性作家将“缺父”与“苦难”进行同构性书写使母亲逸出传统文化中的“弱女子”性别角色的边界,塑造出一批在苦难面前依然昂首挺立的母亲形象。池莉《你是一条河》的母亲辣辣,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泼辣、爽朗,以饱满向上的姿态接受生活给予她的重创:八个孩子多灾多难,死的死、疯的疯、傻的傻,绝情的绝情、离开的离开,但重重的生活打击并未使她向生活低头示弱,她宛如一条腾挪跌宕的河流在历经险滩和巨石暗礁后依然接纳包容着归来的子女,顺着生活的轨迹继续前行。母性主题小说的分寸感在新时期女性作家笔下拿捏得特别好,“缺父”的叙事策略和民间化的叙事视角使母性主题小说还原出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母亲的天空由于缺少强壮父亲的支撑和庇护显得更加低沉,她只能是低沉天空下匍匐于地面上蜿蜒向上的一丛蕻蕻。正是因为有了厚重的生活底色和对生命的顽强持守,母亲形象才有血有肉,真实动人。新时期的母性书写由于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已经祛除了“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笔下温情脉脉的诗意写照,展现出生活粗粝甚至狰狞的真相,或许“存在即合理”才是对辣辣这类不完美母亲的最好诠释。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作家“缺父”的叙事策略取消了家庭内部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使得母性本身的“内在因素”与世俗社会的“外在势力”之间的矛盾得以彰显。母性与人性相通,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折射出时代演进过程中在泥淖中拖曳前行的人性的特质:执着于生,真诚地爱和恨。

“缺父”书写,一方面凸显女性作家“为母则强”的女性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她们为“女性依然是弱者”孤苦无助的现实处境唏嘘不已。这种昂扬向上的写作姿态与母性真实生活处境之间的巨大反差集中体现在女性的社会资源缺乏,母亲的性别身份使她们有时甚至需要以自己唯一的资源——身体作为敲门砖,迎合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社会“居高临下”的要求,通过忍受屈辱和不公来获取蝇头小利,同时还不被作为受益者的子女理解。池莉《你是一条河》中的母亲辣辣,在饥饿年代为了一袋米与粮店老李之间进行着彼此心知肚明的交易,以及与血站老朱头在苦难中掺杂着几分真情的互相扶持,但母亲须臾迎合背后的内心屈辱却不被她的亲生女儿冬儿理解。冬儿对母亲这种混乱的生活状态感到深深的厌弃,决然地与家庭断绝一切关系。鲁敏《墙上的父亲》中的母亲,为了使母女三人挨过孤苦无依的生活困境,依次与三个男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为此母女三人长期忍受着邻居们的闲言碎语。更要命的是这种目的性极强的男女交往对女儿婚姻观产生了负面影响,王蕾觉得“人与人的关系,天生就是相互利用的,就是‘恶’的,就是‘靠不住’的”。

“缺父”视域下的母性书写改变了女性长期处于幽闭家庭生活空间的历史文化处境,打破了中国延绵两千多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格局,母亲通往社会的大门被打开。母亲不再是局限于婚姻和血缘中的性别角色,母亲的性别生存境遇在社会历史场景中得以“全貌式”呈现,作为独立的社会个体存在建构了新的性别意义。传统母性主题小说的叙事空间具有圆形的、完整的、封闭的特征,“缺父”视域下的母性主题小说的叙事空间获得拓展与延伸,然而母亲凭一己之力与强大的男权社会进行正面交锋,往往在重重父权阻力中败下阵来,最终母亲或内心麻木或性格扭曲,凸显出社会处境对母性生存的抑制性与遮蔽性。无论政治如何变迁,无论时空如何变化,母亲永远都是被动的承受者,她处于社会秩序中却无力改变社会秩序。地母原型中对苦难的逆来顺受与对自身毁灭的心甘情愿的负面文化品格通过“缺父”的叙事策略得到冷峻的审视,流露出女性作家对母亲无法改变自身命运的无助感。同时,母亲是在一种非自然状态下被强行带入这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这意味着母亲必须告别传统的女性精神群体来适应当下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母亲所代表的女性气质被边缘化和消音,“男人婆”“女汉子”这类母亲别称实质上是以男性为尺度,漠视女性的自然性别,无形中消弭了两性差异,造成性别角色的错位与扭曲,从而使得母亲形象性别模糊,面目全非。

女性作家在母性主题小说的内涵挖掘上力求彰显母性的社会意义,因而对母亲形象的重写主要从母性与外部生存处境的关系入手,在对历史的沉潜与补白中抽象出母性作为家庭支撑与子女依靠的正面意义。不过,这些作品缺乏女性真正觉醒必不可少的内省意识,未能从性别存在的生命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对女性灵魂世界进行深层叩问,因而母亲形象是残缺的和具有自身局限性的。母亲作为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既需要有社会角色的确认,也需要有作为人的自然性方面的生命实现。她们有追求浪漫激情生活的渴望,有对灵肉合一的爱情向往,更有追求自我价值充分实现的理想,但女性这些发自内心的生命价值追求在此类“缺父”叙事文本中,往往让位于粗粝生活外壳下衣食住行的日常叙事,母性在世俗化、日常化情境中暴露的逆来顺受和思想平庸的负面特质,透露出母亲生命力的衰微。母亲角色背后是母亲生命自我价值的缺失和女性意识的销蚀,母亲形象成为“空洞的能指”。

苦难叙事背景下的母亲形象,虽然表面上获得了自足性和自在性,但精神性质素的空乏使得母亲依然陷于传统文化的性别角色中难以自拔。在辣辣的潜意识中“只有做婊子的才不愿生孩子”,这种自在的生育观是她后来苦难生活的主要根源,众多的孩子既是苦难生活中负重前行的动力,也是苦难生活中提升自我抵达本我的阻力。女性作家将苦难作为母亲自我完善的必经之途,但在苦难中升华主体精神还是在苦难中消弭主体精神的创作倾向选择上,女性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地母原型的影响,将苦难崇高化,凸显母亲在苦难面前如大地般的“藏污纳垢”包容性以及如水般的“百折不挠”柔韧性,安安分分,毫无怨言。因此母亲对苦难生活只有招架之势,未能从苦难中获得超越性,达成对自我和世界更本质的认识。如果说对母性生存处境的还原是女性建构主体性的基础,从民间化视角对地母原型文化品格的审视是以解构方式对女性主体性的修正,那么对母亲生命个体的精神建构则是一种深层次的正面建构,只有从思想观念和意识上将母性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要求,才能从精神维度完成女性自我的超越与救赎。

二、母权异化:母亲身份反思

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借助一整套“男权话语”来建立社会权力结构和调整社会规则,并将女人纳入这一话语系统,使之成为永远的“他者”。因此新时期女性作家往往采用父亲缺席的叙事策略来否定父权制以及父权家庭,实现对男权话语的突围,因为传统的家庭权威以父亲为能指,而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则以母亲为能指。然而,“父亲”角色的缺失并不代表“父权”的颓败,社会权力结构依然是建立在“父亲”之下的。母亲身份使她以管理者身份重构家庭组织,但也仅仅是接管了父权制过渡给她的权力,母亲成为父权秩序的最佳守卫者,因而父亲的“缺席”有时恰恰见证了他作为“权力”的在场。

当母亲被赋权以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回归家庭时,必将借助传统的“家长制”观念来协调自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并利用父亲的余威对孩子施加精神上的影响,积极附和并主动内化的男权社会价值观,不可避免地陷入男权话语的网罗中,成为男权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大的帮凶。徐小斌在《羽蛇》自序中认为“当‘母性’一旦成为‘母权’,它就变得与父权一样可憎,甚至更为可憎”。^{[1](p1)}传统的家族宗法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母亲的潜意识并成为母亲处理家庭事务的不二法则,在事关家族名誉的重大时刻,儿女的个人幸福并不在母亲行使家长权力做出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池莉《你是一条河》中辣辣为了维护家庭的声誉,让从未得到母爱温暖的私生女贵子挺着大肚远嫁给三十来岁的乡下瞎子,临上船时辣辣狠狠地亲了一口这个在灰暗角落里自生自灭的女儿,虽然可以望见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凄苦飘摇,但在辣辣看来这也是命中注定的,让人感到母亲处事果决背后的“残忍”。孙惠芬《秉德女人》中以申家当家人自居的秉德女人,同样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族门面观念,万般无奈地将大女儿承华送给后背像弓一样弯曲的罗锅当童养媳,将身怀六甲的侄女承玉嫁给又老又丑的徐巴拉眼儿。为了维护申家门户的清白,秉德女人自觉维护父权社会秩序,亲手断送了晚辈们后半生的幸福却浑然不知。有学者认为:这些“忘掉”女性与父权制文化之间本质上的对立而被后者同化的母亲被称为“父权母”。^[2]

“缺父”的叙事策略将母亲的妻性剥夺,然而“忠贞守节,从一而终”的为妻之道依然是衡量良母的道德标准,如果她不能按道德伦理规范成为“贤妻”,那么她的“良母”资格同样不具备。“贞节”作为男权文化中母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西方文化体系中都有据可考。安吉拉·卢卡斯指出:“玛利亚在教会传统中的声望使她处于最高位置,她感应而孕,纯洁无瑕,在耶稣出生前和出生后都是童贞女”,^{[3](p18)}人们崇拜的是一位无性而不能获取女性愉悦的母亲。中国流传广泛的女媧造人神话,“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媧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4](p672)}同样为了塑造“理想化的精神之母”将性爱逐出母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洁无疑成为施加在母亲身上的无形道德枷锁。父权社会建构起严密的道德监控网络,使她置身于“性别化的集体匿名凝视”中,必须时刻接受子女道德目光的审视。“作为父权话语系统的俘获者,女人是非勒斯的最佳守护者”,^{[5](p21)}她们自觉接受了男权社会的性别角色规范,作为道德评判者隐匿于文本之中,站在道德的高度对“失贞”母亲投来冷漠、鄙夷的目光。不管女性作家“无心插柳”还是“强赋新愁”,母亲的欲望往往被压抑而在文本中无处可寻,抑或母亲的欲望在文本中被妖魔化。“失贞”母亲的命运在许多文本中被书写,这些带有“污点”的母亲被放在道德的制高点接受着来自世俗社会的审讯,沦为“卑贱的存在”。

身体欲望是一个成熟女性从生命个体本能出发产生的生理和情感的双重需求,但女性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身体欲望在父权话语体系中是被贬抑与被否定的。父权话语发展出一整套关于女性身体的代码系统,满足男性的欲望想象以及实现男性权威,它将欲望想象投向于离经叛道的荡妇与淫女,而用贞节将母亲身体隔绝于欲望之外。“缺父”视域下的母性书写以母性定义女性,女性不得不以孩子为自我命名,以父亲的名义养育孩子,而女性生命个体的真实感官体验——身体欢愉却淹没于男权话语中。辣辣在喧腾的生命河流中孤身一人驾着颠簸的家庭之舟,风雨飘摇中已经承载不起“爱情”这种关乎精神层面的缥缈之物,这与她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视野无关,而与她的现实处境相关。辣辣有她日常生活的标准:“贤良啊,对一个快生孩子的女人写诗什么的呀,不滑稽吗?”务实的她只是将身体当作自己唯一的资源去满足男人,她可以为了生存与粮站的老李和血霸朱老头之间进行不对等的利益交易,也可以出于“行善”答应小叔子,但所做的一切对她自己而言毫无乐趣而言。沉睡的女性身体书写一方面是对父权社会伦理制度的有力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女性抵达生命主体的本真状态无法逾越的鸿沟,母性的生存困境与母性的身体愉悦之间形成一种文本张力。身体书写这个女性主义写作利器在母性主题小说中的空

白无疑是母性书写的父权文化精神隐喻,缺乏生命质感的母性书写不可避免地落入父权话语窠臼中。

“缺父”的叙事策略使父亲和母亲两个相辅相成的家庭角色浓缩成一个长辈角色——母亲,母亲如何对待女儿不仅可以折射出她对女性的认知状态,而且反映其主体意识觉醒程度,因而母女之间关系的渲染成为此类母性主题小说的延伸意义。母亲对女儿的过度依赖和保护,使母女关系在“缺父”的家庭结构中呈现出一种“非常态”的状态。女儿是照进母亲灰暗人生的一缕阳光,她必将飞蛾扑火似的去追逐这一束能慰藉自己逐渐枯竭内心的微光,由聚能效应产生的母爱烈焰将灼伤身边最亲近的人。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母亲的世界只剩下黛二时,她“心甘情愿”的关怀变成乖张偏激的行为施加到女儿黛二身上时,“监控与反监控”和“占有与反占有”成为母女二人幽闭生活场景中的主旋律,也使得母女关系既紧张又倦怠,既愤懑又无奈,这样一种纠结不清的母女关系反复咏叹于陈染诉说的长长短短的故事里。在这种互相折磨的母女关系中,焦虑与恐惧的情绪弥漫于母女生活场景的每一幕,这一切都是母亲灰色人生中被压抑的负面情绪的一种非自然方式的释放。母亲苦心为女儿搭建起一间遮风挡雨的屋子,然而这间屋子终究是没有屋顶的,由于缺少父亲的庇护,始终无力挣脱由性别霸权与政治霸权、经济霸权聚合而成的重重外界压力。母亲内心由焦虑产生的不安全感使得她无法正确处理亲子关系,辣辣可以凭着母性本能将每个孩子庇护在自己身边,解决孩子的温饱需求,却无法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她无暇顾及每个孩子的个性与生命欲求,只是用打骂的方式粗暴处理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正如戴锦华所言,“无法为自己独自生存建立合‘法’性与安全感的女人,其生命压力的出口,便可能富于侵犯性与危险的爱。”^[6]

三、母性谱系:母女纽带重续

母子关系与婆媳关系一直是传统男权文化极力巩固的家庭伦理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供奉于孝亲圣坛的母亲,一般来说是“儿子的母亲”而非“女儿的母亲”。因而母女关系书写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未曾充分展开的主题。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笔下的母女亲情书写,由于急切地融入国家民族话语体系中而昙花一现,母女亲情很难在文化层面得到彰显。新时期女性作家的“缺父”叙事策略使得以子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结构得以打破,母女关系重新书写为女性谱系的重建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

新时期女性作家对重见天日的母女关系书写,往往采用女儿叙事视角对母亲形象进行居高临下地俯视,女儿在文本中承担着“启蒙者”的角色,如池莉《你是一条河》中的女儿冬儿和孙慧芬《秉德女人》中的女儿承民,在叙事结构上往往采用“出走——归来——重返‘母亲后花园’”的结构模式。“女儿的出走”一方面源于“女儿”对粗陋庸俗的母亲失望或对母亲变相的权力控制的洞察,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既定家庭角色的疏离和对女性命运轮回的抗拒。母亲总是力图将自己孕育的生命牢牢抓住,控制在自己身边的势力范围,并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性别生存法则通过代际传承强加给同一性别的女儿。这种传承一方面出于先行者的爱意,另一方面凝聚了深厚的社会内容,被父权制观念驯化的母亲自觉承担起对女儿进行家庭伦理观念灌输的责任,力图把女儿塑造成真正符合男性社会标准的“女性”,使母女之间形成环环相扣的女性命运轮回之链,在这种代际传承和命运复制中将女性长久地笼罩在父权制的阴影下。隐藏在母爱之下的这些复杂内容,使得“女儿的出走”具有挑战父权社会象征秩序的“勇士”气概,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儿的归来”并不是女儿对母亲过往生命历程的认同,而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与母亲隔着时空的长河对话中产生了深切的性别认同。《你是一条河》中冬儿在母亲对她珍藏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吐了一口浓痰后,带着对母亲无休止的谩骂与讽刺的厌倦和对“地面永远扫不干净,大门永远关不上”的家庭生活环境的嫌恶,像断线的风筝扶摇而上飞向自由的天空。她斩断与这个家的一切联系,改名为“净生”,翻开了新的人生之页。但在多年以后,在她自己做了母亲之后选择了原谅母亲,并在母亲临终时感应到了母亲的呼唤。正是因为时间的洗礼和母女之间共同的母性体验,母女这对有着最深亲密感又有最痛苦隔膜的矛盾体之间才达成理解。“女性只有完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母亲怀里分离,恋父,最终放弃恋父再回到母亲身边来,对母亲认同,发展女性气质,如此,她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性感的、能够去爱的、既有母性也有女性气质的一个女人。”^{[7](p8)}

“缺父”的叙事策略使女性作家自如地穿梭于母女之间血脉亲情联结而成的女性生命长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家在“家族小说”这一新时期文学重要的叙事题材中呈现出自觉的性别意识。她

们无意于历史事件的打捞和历史人物的塑造,而是通过女性生命历程的回溯,在生活的细微处体察出女性在性别政治与历史叙事的合谋下处于他者的生存境地,自觉踏上追寻女性性别存在的生命价值与主体精神之途。徐小斌《羽蛇》讲述了从清朝末年到新时期一个家族五代女人百年间与世隔绝的幽闭神秘的生存图景。性格迥然的五代女人在时空的沧海桑田中,在血脉传承中自我复制、自我变异和自我追求,以女性内心的历史对抗外部的男权文化历史,女性命运不可逃遁的悲剧性与创作主体对悲剧的诗意化描述,使小说充满迷离和绝望的审美风格,体现了徐小斌冥想、玄虚和神秘的文学特质。小说以远古神话中太阳氏族中诸神之名来为女性命名,玄溟、若木、乌金、羽蛇等父权话语中表征男性化意象的命名,与女性本身的历史处境构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反讽。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不断质询中,以家族史的探求作为文本结构方式,与通常家族小说很不一样的是,“我”所执着寻觅的是母系家族走过的历程。在女性意识的烛照下,“我”在茹姓的母系家族中完成了自己血缘身份的确认,女性的生命链条在虚构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女性个体生命形态在纪实中得到新的阐释。王安忆以这种不露声色的写作姿态质疑父权文化,为“家族母题”叙事提供了自己的文本创造。张洁《无字》同样讲述了一个家族四代女性曲折跌宕的故事,她们置身于宏大的历史背景,在男性导演的历史纷乱中经受颠沛流离却泰然受之,母女之间的血缘亲情使她们抱团取暖。小说塑造了男权社会精英形象胡秉宸,外表道貌岸然内心自私卑劣,吴为被他所伤后回到母亲怀抱中获得内心的安宁。作家通过母女亲情的渲染来拆解男性精英神话,指明母女亲情是女性之间谋求理解、共鸣、抚慰的“最后的停泊地”。女性退守到纯粹的母女亲情中去,虽有孤独的苦楚却洁净无比。“缺父”是想象性的救赎之路,是万念俱灰后的抱残守缺,是以缺失为代价寻求的自尊、自强与自立。

女性作家这种基于女性主义立场书写的母系家族小说,只能是她们面对强大父权社会的一种残缺的抵抗形式,最终要么成为无现实意义的“乌托邦”想象,要么在抵达自身主体性之前已经成为父权话语的一部分。王安忆《纪实与虚构》沿着母系家族从大漠边塞到江南水镇的迁徙之藤,最终找到的却是“杀戮征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男性社会历史之果,显示出女性建构母系谱系的虚妄。徐小斌《羽蛇》中女主人公羽洞悉世间一切、坚持自我的力量使她始终无法融入这个繁杂伪善的世界,六岁时杀死自己的弟弟使她终身负疚,无法被自己的母亲接纳与喜爱,最终羽用尽全身的血去救活母亲家族中唯一的男性,才使乖戾的母亲显露难得的慈爱,羽最终看清了世上的虚伪和丑恶之后,像感觉到巨大危险的蚌沉入湖底,紧锁自己的心门,将自我救赎的力量寄托于内心深处万籁俱寂的花园。作者通过对母性与人性的审丑,清醒认识到在性别文化压迫下母性与人性双重异化的女性生存本相,对女性不可逃遁的悲剧命运发出绝望的感喟。

“缺父”的叙事话语表征着“肉身之父”的缺席,但“精神之父”依然在场,革命叙事话语中“男性充当着启蒙者和拯救者”的性别关系模式,在新时期母性主题小说依然得到沿袭。“对于这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被解放的女性绝对是陌生的,是无法仅仅依靠自己的本能欲望和直觉感受生活的”,她必须“找到一个男性的精神偶像,这个男性的精神偶像既能规范这个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起到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上保护这个女性的作用。”^[8]父亲无疑是“缺父”家庭中母女共同的乌托邦幻想。鲁敏《墙上的父亲》中“缺席的父亲”成了母女三人想象的诠释之地,欲望的寄托之所。在王蔷“贫贱而哀伤”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犹如空中弥散的气息无处不在,对父亲照片的珍藏,对邻居方甜在父亲怀中撒娇场景的偷窥,特别是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她偏好老很多的“父辈”男人。中年离异男子老温以脂肪为原料堆积成山丘似的腹部,让她获得柔软而结实的满足感。小说结尾处,“王蔷顺着不存在的烟雾慢慢爬上去,摘下尘灰满面的父亲,捧在手上”的幻境描写,使得父亲以“遗像在场”的方式嵌入到王蔷的成长经历中,对父亲身影的反抗与迷恋中形成她的创伤性成长记忆。孙慧芬《秉德女人》塑造了一位见识卓尔、坚韧、顽强的母亲形象,她沉着应对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变化,有着远超一般农村妇女的见识与魄力,带领着自己的后人走过饥荒岁月并两度拉出架势竖梁建房,使申姓家族枝繁叶茂。这位内心强大的母亲一生都在争取命运的主动权,一次次从命运的低谷中爬起来,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匪子胡秉德。在艰难无助的岁月中秉德的模样从未在她记忆中淡去,“秉德女人”依然是她作为家庭主心骨时最理直气壮的身份标榜。秉德女人在生命走向枯竭的时候经常与记忆中的秉德絮絮叨叨地诉说心肠,岁月之河过滤后的秉德形象成为秉德女人暮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回忆。

其实,这种“缺父”书写并非新时期母性主题小说特有的叙事策略,我们可以回溯到五四启蒙文学

中去找寻它的历史参照。五四时期全方位的现代化使得以父子相继“生命链”而成的超稳定文化结构被中断,对“天地君臣父子”封建伦理秩序的破坏使得五四新青年在文学叙事中主动选择“缺父”,以此表明对父权制家庭的决裂。年轻的作家们纷纷将动荡年代孤独飘零的情感寄托于母亲形象,母亲形象代表了生命与情感、和谐与安宁的温馨港湾,是与不合理的父权统治相抗衡的理想力量。此外,“父亲的疏远、缺席或弱势,都容易滋生恋母情节”。^[9]“弑父”与“恋母”这两种感情基调交织在一起,母性主题小说在封建父权文化权威走向末路的五四时代潮流中大放异彩,形成了文学儿女联手抬出“母亲”形象的文学景观。“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作家在“父子”话语系统的断裂处顺势选择了“缺父”书写来实现女性话语的现代性建立,“以母亲的名义重塑无名的自己”。但这种叙事策略的选择并未能使文本获得纵深的意义空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封建宗法制对母亲角色的伦理包装过于巧妙,年轻的女性作家无法透过层层迷雾把握母性主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说我们从《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等作品中,感受到的是西方女性作者的‘入世后’的丰满,我们从20世纪20年代的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等中国女性作者的作品里,感受到的则是她们‘入世前’的单纯。”^[10]另一方面,女性作家在“缺父”的文本语境下重拾母爱主题的出发点,是呼应“人的发现”时代诉求与扭转女性文化地位的卑微。她们对女性价值的重新发现依然未跳出家庭生活场景,无法完全突破父权文化的性别价值观,母亲形象塑造依然陷于“贤妻良母”的传统文化角色难以自拔,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并不具有独立人格主体的自我价值与精神需求,母亲形象主体性建构只能是海市蜃楼。

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母性书写折射出女性意识已由五四启蒙叙事中的朦胧逐步走向自觉。五四时期讴歌式母性主题小说中“万能的母爱”赋予母亲角色的神圣感和崇高感,在新时期女性作家母性书写中表现出解构性的共同趋势。在新时期“寻找自我”的时代主题召唤下,女性作家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一系列关于自身生命本质、生活状态、生存境遇等问题,在家庭与社会、文化与心理的结构关系中重新审视母亲角色。她们力图还原母亲的生存境遇和生活形态,描述母亲的生命状态与心理体验,对母亲角色的社会建构性有了清醒的认识。“缺父”的同构书写加速了母亲角色从家庭到社会的场景切换,母亲角色的转换正是通过这种场景的切换与人物的外显行动来实现的,因而女作家对母亲的重塑停留在外部世界,缺乏女性真正觉醒的内省意识。“缺父”视域下的母性书写表达了女作家一种理想化的母性幻想,通过母亲形象的重塑来彰显母性蓬勃向上的原始生命力,但我们无奈地发现“缺父”视域下的母性书写并未给母亲带来崭新的生命空间与灵动的精神天地,我们在文本中只感受到了母亲的压抑与无助,感受到母亲生命力在现实困境中的萎缩,在传统文化因袭影响下母性并未开出灿烂的生命之花。母系谱系的梳理和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虽然打开了母性书写的另一扇门,但也彰显出母性成长之路的坎坷,透露出女性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无法改变文化宿命的无奈与落寞。同时新时期母性主题小说在母亲形象的重塑过程依然挪用男性话语,未能运用女性话语表达女性日常生活经验背后被压抑的个体欲望和精神诉求,母性在抵达主体性精神的彼岸中容易重新落入父权话语的包围中。

参考文献:

- [1]徐小斌.羽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2]蒋海新.话语与母性:一种文本叙事的颠覆[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67-72.
- [3]Angela M. Lucas.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Religion, Marriage and Letters* [M].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3.
- [4]李 昉.太平御览[M].夏剑钦,王巽斋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5]方 生.后结构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6]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1996,(3):47-56.
- [7][美]阿琳·克莱默·理查兹.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M].刘文婷,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
- [8]王富仁.男人与女人 中国与美国[J].东岳论丛,2011,(4):73-79.
- [9]罗执廷.论鲁迅的负面女性形象书写[J].中国文学研究,2017,(2):95-99.
- [10]王富仁.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8.

(责任编辑:刘伏玲)